



诗仙词圣精品文库

邓魁英
主编

2.2

出版社

杜甫诗选注

沈文凡
选注



铸仙词圣精品文库

杜甫诗选注

沈文凡 选注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杜甫诗选注/(唐)杜甫著;沈文凡选注. —长春:吉林文史出版社,2000.1

(诗仙词圣精品文库/邓魁英主编)

ISBN 7-80626-517-1

I. 杜… II. ①杜…②沈… III. 唐诗—作品集—中国
IV. I222.742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4123 号

[吉]新登字 07 号

选题策划	徐 潜 王曦昌
书 名	杜甫诗选注
作 者	沈文凡
责任编辑	安 静
封面设计	李岩冰
出版发行	吉林文史出版社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) (邮编:130021 电话 0431-5634654)
印 制	长春市第十一印刷厂
开 本	36 开 850×1168
字 数	109 千
印 张	5.25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4 000 册
书 号	ISBN 7-80626-517-1/I·121
定 价	7.40 元

诗仙词圣 双璧争辉

——《诗仙词圣精品文库》的代序

唐诗和宋词是中国文学史上极辉煌的两个篇章，一向被人们称作古代诗歌中的双璧。唐诗既有承袭汉魏六朝以来的古诗、乐府等“古体诗”，又创制、发展了五、七言绝句和律诗等“近体诗”。可以说唐诗是众体兼备，集古今诗歌体式之大成。宋词又称曲子词，是配合乐曲而填写的歌词。它所配的乐曲是隋、唐以来从西域传入或在民间流行的“胡夷、里巷之曲”。在当时词调很多，不同的词调都有各自的名称，即词牌，如《浣溪沙》、《水调歌头》等。这种句式长短多变，韵律优美和谐，平仄格式严谨的词被文人们熟练地掌握，乃成为一种与诗歌并行不悖的新诗体。

唐诗、宋词都拥有众多的作家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作品，并形成了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。从现存资料看，清人编的《全唐诗》共收录二千二百余名作者的诗歌四万八千九百余首，近年陈尚君辑校的《全唐诗续拾》又增补作者逾千人，诗作四千三百余首。唐圭璋编的《全宋词》收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，词作一万九千九百余首。后来孔

凡礼又编《全宋词补辑》增补作者上百人，作品四百三十余首。唐诗、宋词有这么多的作家作品被后人传诵、保存，就足以说明其成就之卓越和具有的高度吸引力，它们不愧为我国诗歌宝藏中一宗可贵的财富。

唐诗在社会功用上与宋词有所不同，唐诗在抒发情感、描写景物之外，还可以用来记叙历史事件、社会现象和个人的生活经历；又可以议论时政和世风、品评书法、诗、画，甚至有时还能以诗歌作为奏疏的补充。而宋词则主要是用来写景、抒情的，其叙事、议论的成分不多。尤其是词在初期，作者常常是代歌妓填写专供演唱的歌词，为适应娱宾遣兴之需，在内容上多写风花雪月，离别相思，在语言和手法上也难免带有恻艳、纤弱的格调。所以人们在谈到唐诗、宋词之不同时往往有“诗庄词媚”的说法，也就是说从总体来看诗比较严肃、庄重，词比较艳丽、柔媚。但也不尽然，到后来宋词在婉约之外，也还有豪放一体，在内容和手法上拉近了词与诗的距离，其社会功用也有所扩展，成了别是一家的诗体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唐诗、宋词的群众性，可以说是雅俗共赏，老幼皆宜的。千百年来不只文人学者欣赏、研究它们，广大群众也都非常喜爱它们。在校的学生要用唐诗、宋词作为教课书，社会上从鬓发苍苍的老人到刚刚学语成音的儿童，也都会背诵一些唐诗、宋词。尤其是在进行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传统文化、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，宣传、推广唐诗、宋词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。

唐诗、宋词产生的年代距我们已经很遥远了，作家们所处的历史政治环境与今天的差别极大，他们的价值观、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与我们也截然不同。那为什么还会

赢得我们的理解和欣赏呢？我想一方面是唐诗、宋词的思想内容还有些能够引起我们共鸣的东西。像那种忧时念乱，关怀国家命运的爱国思想；憎恨丑恶反对暴虐的正直品格；那热爱大自然，追求美好事物，向往自由和平的高尚情操；那眷恋家乡，对亲人、邻里、朋友的深厚情意和对爱情的执着，都可以使我们理解和感动。还有作家们对社会生活、人生经历的各种体验与感悟，以及他们的文化修养、哲学观念和审美的灵性等，有很多都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，也都会给我们不少启发。我们不妨举些为人熟知的诗词来看看。单拿见月思乡这一主题来说，“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”，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“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”等诗句，几乎是家喻户晓，曾拨动过多少人的心弦！又如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，“虐人害物即豺狼，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”等对剥削者的揭露和抨击，会使我们更加深对封建社会的认识。还有他们笔下那巍峨的华岳，“去天不盈尺”的蜀道，以小天下的泰山，那来自天上的黄河，“无语东流”的长江，以至“直节堂堂”的杉柏，“千朵万朵压枝低”的鲜花，许许多多高阁雄关，古迹名刹，都会引发我们对祖国山川景物的热爱，提高我们对自然美的鉴赏能力。甚至那上青天揽月，乘扁舟济海以摆脱束缚的遐想，那“笑富贵千钧如发”的态度，“以酒消愁”的行为，也都是我们今天仍能理解和给予同情的。这些应该说正是唐诗、宋词永不衰竭的生命力之所在。

在艺术方面唐诗、宋词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。作家们不只能描写奇异的事物，抒发特殊的感受，而且更善于在平常的生活中捕捉住平常的事物和情感，将它们诗化，

即通过丰富的想象、新颖的比喻、巧妙的夸张等多种手法艺术地表现出来。像用“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许多愁”形容忧愁之浓重；用“绿肥红瘦”、“红稀香少”描写鲜花的凋零；用“毅纹”、“明镜”比喻湖水，用“玉盘”、“瑶台镜”比喻明月等等，都能引起人们美的联想。还有那些写爱情、相思的，如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，“春心莫共花争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”，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等名篇佳句更是影响广远。另外，唐诗在格律上较之前代诗歌更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；词为了合乐在韵律方面的要求更严格，他讲究五声、五音、六律以至清浊、轻重。所以无论当时合乐与否，诗和词在今人诵读起来也都声调优美，朗朗上口。这也是唐诗、宋词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之一。

总之，从唐诗、宋词的内容方面说，确实可以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东西，以丰富我们的知识，陶冶我们的情操；从艺术方面说，诗人们的艺术创造更能使我们得到一种美的享受，提高我们的文学艺术修养。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了这套《诗仙词圣精品文库》丛书，为唐诗、宋词的爱好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本。从为数众多的作家中选出部分名家，从卷帙繁富的作品中选出部分精品，确实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，选注者们付出了很多心血是可想而知的。在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，我试着写出以上的认识，以表示对他们的钦敬与祝贺！

邓魁英

1999年10月于北师大

前 言

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。他的诗歌从不同角度迅捷、真实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,尤其以“新闻快递”的形式全面展现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间的历史面貌,在唐代就受到孟棻的称誉:“推见至隐,殆无遗事,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”(《本事诗》)。在中国诗歌史上,杜甫既是一个“集大成者”,又是一个“开新世界”者(王禹偁诗:“子美集开新世界”),他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,具有前所未有的广阔性、深刻性和严谨性;在诗歌体裁方面,“尽得古今之体势,而兼人人之所独专”,他的五古、七古、五律、七律、排律、五绝、七绝诸体都达唐代超一流的水平,他还创造了极富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——“沉郁顿挫”。与李白并称,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。

杜甫,字子美,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(712),卒于唐代宗大历五年(770)。祖籍襄阳(今湖北襄樊),自曾祖起居巩县(今属河南)。曾居于长安少陵,因自称“少陵野老”。

杜甫出生于“奉儒守官”的家庭，七岁能诗。二十岁后漫游吴越齐赵。天宝三载(744)结识李白，同游梁宋齐鲁。天宝五载到京都长安应试，由于权相李林甫作祟而落第，留居长安十年。这十年是天宝中期到末期，是唐朝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加深，社会危机逐渐显露的时期。天宝十四载始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。安史乱起，诗人颠沛流离，经历了逃难、陷贼、任左拾遗、贬官华州、弃官远游等遭遇。乾元二年(759)，杜甫到达成都后，寓居于成都浣花溪草堂。时严武为剑南西川节度，荐杜甫为节度参谋、检校工部员外郎，故世称杜工部。大历三年(768)，杜甫携家出峡，漂泊于江陵、公安、岳州、衡州一带江上。大历五年，病卒于湘水舟中。

杜甫的一生，是悲剧的一生，而他个人的悲剧又是和时代的悲剧、人民的灾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。他个人的苦难越深，经历越丰富，对时代、人民的生活体验就越深切。由于有这样的生活基础，再加上他具有进步的思想、高尚的品质、伟大的人格和千锤百炼的艺术技巧，他就出色地完成了用诗歌反映那个时代的使命，获得了“诗圣”的崇高称号，他的现实主义诗歌也就成为那一时代的“诗史”。

杜甫悯民、爱国、忠君思想在诗中有充分的表现，真诚、深厚、强烈。

杜甫“饥困忧时，婆心侠气”(《唐诗归》钟惺语)，总是能够推己及人、忧恤百姓。杜甫的惓惓于国计民生、救援悲悯意识强烈而迫切：“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”。人评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“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

也”(《碧溪诗话》)。这种“忧黎元”的思想是发自内心的，而决不是“取办于笔舌”(《杜臆》)的虚伪的“仁政”思想。杜甫对人民疾苦的真挚的、深厚的同情，类似人道主义性质。杜甫为人民的苦难而忧：“宵旰忧虞轸，黎元疾苦骈”(《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》)，“道州忧黎庶，词气浩纵横”(《同元使君春陵行》)，“苍生未苏息，胡马半乾坤”(《建都二十韵》)，“往者灾犹降，苍生喘未苏”(《行次昭陵》)；杜甫多方面地反映人民的苦难，他要让上层统治集团了解，他要让天下周知：“请哀疮痍深，告诉皇华使”(《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》)；他分析造成人民苦难的原因，提出拯救人民苦难的方法：“万姓疮痍合，群凶嗜欲肥”(《送卢十四弟侍御归上都二十四韵》)，“回首黎元病，争权将帅殊”(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四十韵》)，“恐乖均赋敛，不似问疮痍”(《夔府书怀四十韵》)，“必若救疮痍，应先去螫贼”(《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》)，“谁能叩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”(《宿花石戍》)。杜甫“忧黎元”的思想，尽管出自儒家仁政思想，但由于它更多地来自诗人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，因而也就超越了一般的“仁政”思想范畴。

杜甫虽然不在其位，但却时时关注时事，关切政治，关心祖国的命运，这是对儒家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、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”思想的突破。杜甫对祖国的无比热爱，首先表现在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上：“乾坤含疮痍，忧虞何时毕”(《北征》)，“不眠忧战伐，无力正乾坤”(《宿江边阁》)，“向来论社稷，为话涕沾巾”(《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》)，“社稷堪流涕，安危在运筹”(《西阁口号》)，“幽蓟余蛇豕，乾坤尚虎狼”(《有感五首》)，“血

战乾坤赤，氛迷日月黄”（《送灵州李判官》），“国步初返正，乾坤尚风尘”（《赠别贺兰铤》），“社稷缠妖氛，干戈送老儒”（《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》）。面对国家危机，人民苦难，杜甫表现出了自己或劝励他人的强烈的为国牺牲精神：“介立实吾弟，济时肯杀身”（《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》），“济时敢爱死，寂寞壮心惊”（《岁暮》），“国之社稷今若是，武定祸乱非公谁”（《徒步归行》），“克复成如此，安危在数公”（《收京》），“再光中兴业，一洗苍生忧”（《凤凰台》），“遥拱北辰缠寇盗，欲倾东海洗乾坤”（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》）。为了国家的中兴事业，杜甫处于困顿时期，仍然不停地出谋划策，积极用世，关心国家命运，这是杜甫伟大人格的体现。

杜甫意存社稷、心念帝室，真诚、强烈而执著：“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莫夺”（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），这是他内在感情的由衷表露。杜甫一生经历了玄宗、肃宗、代宗三朝，他对国君的忠诚事实上是和他的爱国悯民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：“上感九庙焚，下悯万民疮”（《壮游》）。皇帝国君作为封建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，是当时国家的化身。在战乱频仍、民族矛盾尖锐、国家即将覆亡的特定历史时期，忠君、爱国、悯民是相融通的。因此，我们对杜诗中反反复复表达的忠君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：“尚想趋朝廷，毫发裨社稷”（《堂客》），“时危思报主，衰谢不能休”（《江上》），“霜天到宫阙，恋主寸心明”（《柳司马至》），“恋阙劳肝肺，论材愧杞楠”（《楼上》），“恋阙丹心破，沾衣皓首归”（《散愁》），“不知二圣处，私泣百岁翁”（《往在》）。忠君与爱国一致，忠君与爱民一致，这是杜甫政治理想的一个特色。杜甫对自己所尽忠的国君是有自

己的理解和希冀的：“至今今上犹拨乱，劳身焦思补四方”，“周宣中兴望我皇，洒血江汉身衰疾”（《忆昔二首》），“天子废食召，群公会轩裳”（《壮游》），“兵戈未息人未苏，天子亦念西南隅”（《入秦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》），“天子亦应念奔走，群公固合思升平”（《释闷》），杜甫希望国君乱极思治，克还旧都，恢复中兴，忧世救时。用意恳至，论事切中，忠爱之诚蔼然可见。杜甫的忠君对臣属百姓亦有要求和规范：“朔方气乃苏，黎首见帝业”（《故司徒李公光弼》），“安得覆八溟，为君洗乾坤”（《客居》），“几时高议排金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”（《寄柏学士林居》），“天地日流血，朝廷谁请缨”（《岁暮》），“大厦倾宜扶，君臣各有分”（《别张十三建封》），“王室仍多故，苍生倚大臣”（《奉送韦中丞之晋赴湖南》），希望臣民都能报效国家，为天子分忧。“忠君”与“爱民”统一在反对安史叛乱、维护国家统一的范围里。这是一种在某种程度上超越维护封建政权、维护封建君主统治范围的爱国主义。

杜甫作为诗人，给我们印象最深的一点是，在万方多难的社会背景下，在颠沛流离的境遇中，他具有现代职业新闻记者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，思人所不能思，道人所不敢道，不论是远闻而赋，还是近睹而作，皆能关注时事，捕捉热点，真实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本质。他采集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范围之广、角度之新，前所未有。杜诗实际上就是用诗歌形式写的编年史。其价值在于，用精美的艺术形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各种典型的新闻事件，表现了他的忠愤激切、爱国忧君念民之心。宋祁就称誉道：“善陈时事”（《新唐书·杜甫传赞》）。

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、《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入京二首》、《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》、《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》等从诗题上就可看出和现代意义上的动态新闻别无二致。《唐宋诗醇》就评《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》道：“可作讨贼檄文，亦可作报捷露布。”唐玄宗的传位肃宗、宣诏罪己等上层新闻，杜甫有诗反映：“窃闻天子已传位，圣德北服南单于。花门剺面请雪耻，慎勿出口他人狙”（《哀王孙》），浦起龙评云：“‘窃闻’四句，寄与不久反正消息而戒其勿泄，慰之也。丁宁惻怛，如闻其声”（《读杜心解》）。“忽闻哀痛诏，又下圣明朝”（《收京三首》）的新闻快递，当然缘于作者对于最高统治者的希冀与对民生的关怀：“公（杜甫）尔时身远阙廷，忽闻新诏，此心何等雀跃”（《杜诗镜铨》）。“愿闻哀痛诏，端拱问疮痍”（《有感五首》）是以韵语摅说议的诗，“读此五首，皆救时之硕画，报主之赤心，自许稷契，非真谏语……而皮相者谓公志大才疏，良可悲也”（《杜臆》）。敌我军情杜甫亦及时传递与披露。如闻听敌败：“近闻昆戎徒，为退三百里”（《塞芦子》），条陈边事，洞悉时势，岂只一般的新闻报道？《读杜心解》认为“此杜氏筹边策也。灼形势，切事情，以韵语为奏议，成一家之言矣。”广德元年（763）杜甫流寓梓州作《远游》诗：“似闻胡骑走，失喜问京华”，顾宸注引王又宣曰：“闻贼破而喜，人之常情，种种如画，老杜真写生手也”。《唐书》载，永泰元年（765）十月，郭子仪与回纥定约共击退吐蕃，时仆固名臣及党项帅皆来降。大历元年（766）二月，命杨济修好吐蕃，吐蕃遣首领论泣陵来朝，杜甫因此而作诗云：“近闻犬戎远遁逃，牧马不敢过临洮……似闻赞普更求亲，舅甥和好应难弃”

(《近闻》)。杜甫对唐王朝军队的形势十分关注：“还闻献士卒，足以静风尘”(《观安西过赴关中待命二首》)，“复道收京邑，兼闻杀犬戎”(《收京》)，“闻道河阳近乘胜，司徒急为破幽燕”(《恨别》)，都表达了深切而强烈的关注之情，尤其是“剑外忽传收蓟北，初闻涕泪满衣裳”(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》)，更能看出杜甫的喜怒哀乐和国家的安危盛衰息息相关。

战乱消息难通，但诗人关注国家命运之意，惦念亲友之情更为焦急迫切。诗人对每一重大时事都表示关注。如“再有朝廷乱，难知消息真。近传王在洛，复道使归秦”(《伤春五首》)，以五言排律纪时事，伤朝廷之乱，“切劘当世”(《杜诗详注》引卢世淮语)。“秦中驿使无消息，蜀道兵戈有是非……莫愁剑阁终堪据，闻道宋州已被围”(《黄草》)，此诗在夔州遥慨蜀乱，“中巴不曾消息好，暝传戍鼓长云间”(《秋风二首》)，此首伤蜀乱，全是实写。杜甫对亲友的关切尤其富有人情味：“九度附书向洛阳，十年骨肉无消息”(《天边行》)，“汝迎妻子达荆州，消息真传解我忧”(《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》)，“童稚情亲四十年，中间消息两茫然”(《送路六侍御入朝》)，“无家闻消息，作客信乾坤”(《刈稻了咏怀》)，“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”(《梦李白二首》)，“故国三年一消息，终南渭水寒悠悠”(《锦树行》)，诗人苦于消息的难知，为祖国的命运、亲人的境况而忧心如焚：“乱离知又甚，消息苦难真”(《遣忧》)。

杜甫诗强烈的时代气息、丰富的社会内容缘于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，这是其诗的内在特质；同时也与他了解社会、反映现实的方式有关，这是外在的表现。杜

甫诗多用问答体，颇类似当代新闻报道所用的采访形式。或单刀直入，直奔主题；或委婉含蓄，迂回包抄。如《送高三十五书记》是一首反对黠武战争，“愿休王师”的非战诗。诗人设为问答之词：“请公问主将，焉用穷荒为……借问今何官，触热向武威”，“送书记，却从主将发端，设为商略，以讽穷兵之非，立言有体”（《唐宋诗醇》）。这情景犹如公开的访问，公开的曝光。“问之不肯道姓名，但道困苦乞为奴。不敢长语临交衢，且为王孙立斯须”（《哀王孙》），写身陷敌中邂逅王孙，问其姓名不得，“曲尽贼中相逢心胆俱怯光景”（《岷佣说诗》），此种情景，犹如暗访。诗人“所过频问讯，到日自题诗”（《奉使崔都水翁下峡》），问讯的内容牵涉方方面面：“三叹问府主，曷以赞我皇”（《望岳》），“沾衣问行在，走马向承明”（《送李卿晔》），“西江使船至，时复问京华”（《溪上》），“系书请问燕耆旧，今日何须十万兵”（《渔阳》），“为问彭州牧，何时救急难”（《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》），“借问悬车守，何如俭德临”（《提封》），这些发问，是诗人以主持人身份出现的发问，其中倾注着作者满腔的爱国热情，诗人的焦虑、忧患、关切都清晰可感。杜甫的名篇《兵车行》、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等纪言纪事结合得就非常紧密。如《兵车行》通过问答，往深广两个方面延伸、挖掘，逐步揭示黠武战争的严重后果。在征人的答词中，先说以往之事，再说眼前之事，非常深刻地揭示出役夫的心理：“‘长者虽有问，役夫敢伸恨’，寻常读之，不过以为漫语而已。更事之余，始知此语之信。……‘虽’字，‘敢’字，曲尽事情”（《吴礼部诗话》）。当然，役夫所说的话，就是作者要说的，只不过是通役夫之口来诉说而已。“此体创自老杜，讽刺时事而托为征

夫问答之词”(《唐宋诗醇》)。《三吏》、《三别》是杜甫在唐肃宗乾元二年(759)春天写的一组“即事名篇,无复倚傍”的新题乐府诗,是杜甫叙事诗中最优秀的作品。“‘三吏’夹带问答叙事,‘三别’纯托送者、行者之词”(《读杜心解》)。唐诗中大量运用对话是从杜甫开始的,这与诗人用诗歌形式记录采访内容、反映时事有关,也是诗人对传统的叙事诗所进行的改造。“借问新安吏,县小更无丁?府帖昨夜下,次选中男行。中男绝短小,何以守王城?”(《新安吏》)诗人与吏的对话是两问一答,叙情若诉,情状逼真。“借问潼关吏,修关还备胡……胡来但自守,岂复忧西都?”“中十二句,详述问答之语,神情声口俱活”(《读杜心解》)。诗人以叙述为议论,选锋命彀,抓住关键问题发问,情理切实,不失毫芒,确实是真正的“焦点访谈”。《石壕吏》中的问答虽不是在作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展开的,《三别》“《新婚》妇语夫;《垂老》夫语妇;《无家》似自语,亦似语客”(《读杜心解》),但作者并不做旁观者,而是在客观叙述的基础上,寓托了自己的思想感情,以潜台词的形式表现了出来。

杜甫诗歌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取得了杰出的艺术成就。他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,迅速地载录典型时事,歌咏所见闻事,上悯国难,下痛民穷,忧深思远,具一代兴亡,将中国古代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杜甫在继承前代传统的基础上,创造出了《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》、《北征》等熔述志抒怀、叙事绘景、纵横议论为一炉,将个人经历遭遇和时事政治、人民生活融为一体的现实主义叙情长篇。这种规模宏大、气势磅礴,以所经为

纲,以所见为目的夹叙夹议的煌煌巨篇,是杜甫对现实主义诗歌的重大发展,它增加了现实主义诗歌反映生活的容量和深度,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时代总体面貌的史诗式的作品。另一方面,他又创造出了“三吏”、“三别”这种迅速反映时事而又有很高典型性的叙事诗,这在诗歌史上是一种创举,“杜不拟古乐府,用新题纪时事,自是创识”(《螭斋诗话》),具有阔远的时空意识、时空范围,具有高度的概括性。杜甫的短篇长韵中,都有具忧国忧民情怀的自我形象在。他的诗思想深厚博大、感情深沉凝重,意象雄浑苍茫,表现手法沉着曲折,结构波澜起伏,意境崇高悲壮,形成了富有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的诗歌风格——沉郁顿挫。

沈文凡

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于吉林大学